

評「中國之年鑑」

合作出版社出版

# 評『中國之命運』

陳伯達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國之命運』，還未出版的時候，重慶官方刊物，即喧譁該書是由陶希聖擔任校對的。許多人覺得奇怪，蔣先生既是國民黨的總裁，為什麼要讓自己作品，交給一個曾經參加過南京漢奸羣，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對同盟國，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衛千絲萬縷地糾合在一起的臭名遠著的陶希聖去校對呢？難道國民黨中真的如此無人嗎？『中國之命運』出版，陶希聖又寫了一篇歌頌此書的文章，中央週刊把它登在第一篇。這又使得許多人奇怪，為什麼中央週刊這樣器重陶希聖的文章，難道蔣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聖的文章去傳佈不成？總之，所有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們的驚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國之命運』既是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就因蔣先生的關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當此抗戰處在重要關頭的時候，大家想蔣先生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本東西，應該是對於如何準備對敵反攻，配合盟國作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重大問題，有所指陳。因為盡人皆知，今日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是抗戰，而不是其他。但大家讀到『中國之命運』後，卻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和人們所期望的卻相反。而且，關於抗戰的問題在全書二一三頁當中，只佔了十二頁半，全書的中心是談內政問題。一言蔽之，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實際上主張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或新專制主義（雖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義』的帽子），因此，使人們大失所望！

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素來鄙薄那種掩蓋自己政見的人，蔣先生並不掩蓋自己的政見，在這

一點上，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蔣介石先生此書，是不同意的。我們既有不同意見，我們就有責任把自己的意見公開出來，以求國人之審察。蔣先生也說過，『如有人對國民黨的行動或態度有什麼錯誤，請你就應該來糾正他，來補救他。』那末好罷，我們就提出意見來和作者及讀者商討。這應該是完全必要的事，因為蔣先生此書所討論的是關係於中國之命運，關係於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故不但每個共產黨員應該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而且是每個中國愛國人民應十分注意，絕對不能忽視的。近日國民黨方面竟在圖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國國民黨指導的中央通訊社業已公開發佈了這個消息，可謂到了怪論百出的時期。我們共產黨人自然不能默爾而息，但這種怪論是有根據的，只要一讀『中國之命運』，就可以找到這種根據。因此，使我們更加不能默爾而息，本文所批評的限於書中的幾個根本觀點，至於書中的其他觀點，以及對於許多觀點的詳盡批評，只好見諸另文及別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讀者乃至任何愛國人民，如果對本文有不同意見，我們希望提出辯論。真理是不怕辯論的，怕辯論的就不是真理。無數的國民黨刊物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批評得一塌糊塗，我們至今還沒有回答，現在就以蔣先生此書為契機，發表我們共產黨人的意見吧！

## 一 關於中華民族

蔣先生此書對於中華民族的了解，和本來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不相符合。此書說：『我們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民族血統論，本來是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這類怪論去作為進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蔣先生也以血統立論，實屬怪事。這類怪論，決不能解釋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平日我們習用的所

謂：『中華民族』，事實上是指中華諸民族（或各民族）。我們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這本來是不用多辯的。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反滿運動，就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舉行的，而且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就明明白白寫過：『中國境內各民族』，否認這種見解，等於否認孫中山先生及其主義。作者以孫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卻別開生面，承認中國只有一個民族。這是很可駭怪的意見。按照作者的見解，則孫中山先生稱辛亥革命爲民族革命。這不是無的放矢嗎？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要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這又不是無的放矢嗎？蔣先生的意見不明明是和孫先生的意見相違反嗎？

我們請研究一下，漢族和蒙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藏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西來的回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漢族和苗族、猺族本來是『同一血統的大宗支』嗎？漢族和羅羅（犬旁）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嗎？出自何經？據於何典？這是從那裏考證出來的？作者引了詩經『文王孫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難道現在中國諸民族都是文王的孫子嗎？凡此都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常識，並不需要什麼高深學問，才能理解的問題。作者違背了這點常識，故弄得毫無是處。在此問題上，作者還提出所謂『婚姻的系屬』，但是我們也請研究一下，難道漢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記了這種歷史曾經是漢民族統治者向匈奴民族統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種悲劇）就使得匈奴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難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變成了漢民族的『宗支』嗎？若然，則近代許多中國人（其中包括現在國民黨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華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嗎？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塗賬，如果那樣解釋，則漢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衝突嗎？）五胡亂華，南北朝那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又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貞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吐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夏，女貞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等等：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就都成為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勳等等這一切可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參俎豆於千秋』嗎？按照作者關於民族的解釋和歷史的演變，則全部中國歷史，必須完全推翻，而我們民族也寄託於烏有。

蔣先生說：『至於各宗族，歷史上共同的命運之造成，則由於我們固有的德性，足以維系各宗族內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道德。』也請研究一下，根據前面所列舉的史實，我們歷史上的民族鬥爭，曾經那未殘酷，那未無情，如果現在按照作者所說，那又將作何解釋呢？是的，歷史上漢民族在反對異民族侵入的時候，是有兩種人的根本分別的。一種人是廣大民衆，他們流血犧牲，抗拒外患，是保衛祖國與光復舊物的基本動力；另一種人，則是一些腐

敗的統治者，他們在異民族侵入面前時常採取『寧贈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天子之尊』，向異民族的侵略者稱臣稱子稱姪稱孫，而每年貢納很多銀帛，殺戮抗戰的大將以求取得其寵幸，（最好請看五代和宋朝的歷史吧。）這些皇帝和臣宰們，時常拿出什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和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這些法寶，來馭人民。大概他們對於異族侵略者的這種行徑也就算是實行了他們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德性吧！但是，這些行徑，對於我們根本又有什麼值得誇耀呢？

照科學的了解，民族的特徵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繫性），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結構。民族的鬥爭是社會分化為階級的歷史結果。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我們現在所進行的戰爭，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為人類的永久和平而戰』，不僅如此，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比如中國以前人居中原的民族，都在中原和漢民族同化了，今天滿民族在事實上也已同化于漢民族了。但，這決不是由於什麼漢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於他們在內地和漢民族混居，漢民族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後來並且在政治上，都比較他們前進，比較他們佔優勢，而在人口數量上也較優越，這樣就在長期殘酷鬥爭中，逐漸地同化起來。

現在是科學昌明的世界，民族歷史必須按照科學去解釋。法西斯主義曲解民族歷史，削改民族歷史，捏造民族歷史的伎倆，決不足為訓。如果拿這種東西作為國民的教本，就是愚弄國民。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捏造這種單一民族論，其目的就在於提倡大漢族主義欺壓國內弱小民族。我們漢民族本來也是一個很弱的民族，正應和國內一切弱小民族進行平等的民

主的結合，才能抵禦侵略者。如果我們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漢族去欺壓國內其他弱小民族，那就會給敵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於我們民族解放的事業。這是每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所應該注意的。

中國和外國的一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總是盜竊民族爲私有，好像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請研究一下，民族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呢？我們這民族的絕對大多數，不是工農羣衆嗎？如果沒有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民衆，我們民族從何處得到衣食住，從何處組成抗戰的軍隊，又從何處有文化？工人農民不正是民族的主體嗎？不正是他們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嗎？不正是他們才真正配稱代表嗎？而其他的人，反對工農大衆的人們，自稱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種盜竊嗎？既然勞苦大衆是民族的主體，那末，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是很明顯的道理嗎？把勞動人民看成至下，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嗎？

誰是民族的主體？答覆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這個問題，才解釋得了民族的力量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我們民族的組成以及過去所以衰而復興亡而復存的問題，才解釋得了如何準備反攻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問題（即要不要動員民衆實行民主的問題），才解釋得了抗戰後中國誰才應當爲主人翁的問題。在幾年前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共中央許多文獻，曾給我們答覆了這個問題，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卻把『少數人士』和『德性』當作民族的決定者，這就是我們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關於中國之命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

## 二 關於中國歷史

我們繼續談中國歷史，特別說一說近代中國的歷史吧，中國歷史應該是民衆的歷史，因爲

沒有中國民衆，就沒有中華民族，中國歷來和自然界戰鬥和黑暗制度戰鬥和侵略者戰鬥中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勞苦民衆，民衆是中國歷史的主要動力。中國民衆歷來創造一切幸福，但是，他們自己卻沒有了切幸福。中國勞動人民和民族的苦難戰鬥，但是，過去一切果實卻被少數統治者竊取而去，而自己則仍落到最愛苦難的結果。每當中國民被統治者剝削壓迫得痛苦最喘不過氣的時候，外患也就隨之而來，但民衆又成爲『我必復之』的力量。蔣先生說：『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消滅了』。這話是完全不對的。事實上，滿族入關以後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統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廣大人民羣衆仍然是最富於民族思想的，並且不斷地進行了民族鬥爭。歷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轉移，則民衆的自覺力量也越大。在滿清入關以後，中國人民的民族思想遠比過去任何異族統治中原時代要廣大，要深入，要長遠。三合會的組織的蔓延及其長期不被消滅，就是最好的說明。孫中山先生也說：『高等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這是公道話。民衆的民族思想的發展，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隨的就是腐敗人們奴才思想的發展，而其登峯造極的代表人，就是作者書上所不斷稱讚的『曾滌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記呀！這是滿清朝廷因爲他剿漢有功而給他死後的謚號）至於作者關於滿清的歷史如此寫着：『有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的精密，猶能紹漢唐的餘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爲元代不及，……假使滿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仁同，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但，這是時代與思想的關係，我們非所望於當時的滿清能施行這樣政策，固不可求備太苛。……』這些話裏，一點民族思想也沒有，則是千真萬確的。

清代中葉，中國民族遇到了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

義國家。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把持其資本主義的優越經濟力量，打開了中國的長城，但中國人民並不是不能抵抗這種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國抵抗力的軟弱，是由於滿清朝廷，一方面在國內各民族之間所造成的民族牢獄，另方面在人民之間所造成的專制主義牢獄。作者說『我們百年來國勢的凌夷，民氣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條約為造因。』這是倒果爲因的說法。中華民族爲什麼會被釘上不平等約的枷鎖？這難道不是因爲萬惡的滿清黑暗專制政治，使得民氣不得發揮，人民不得奮發起來抵抗侵略者，才產生出來的一種結果嗎？如果按照作者的說法，則在訂立不平等條約之前，應該是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的時候了。但是，既然國勢鼎盛民氣興旺，爲什麼又會有不平等條約呢？

但作者又說：『國恥之所由招致必須追溯於滿清之腐敗，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這不是『原因』了嗎？如果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說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如此邏輯，豈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這裡說的是『政治的敗壞』（帶一筆，作者不願意說是專制政治，此點我們後面還要說及。）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讚滿清一代『建國規模的宏遠政制政令之精密』嗎？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說『尤其是學術與社會的衰落』所以有國恥。可是，作者不是談過嗎？『滿清道豐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爲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冒取宋學與漢學而當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樣，宜若國恥可以由此減少了。爲什麼又弄得國恥如麻呢？歷史的教訓，顯然是和作者所說的相反。原來，中國之弄得國恥如麻，恰恰是因爲曾國藩李鴻章的『湘軍淮勇的成功』。不是嗎？請研究一下太平天國曾統治了許多省份，時間十餘年，和外國人也有來往，但是太平

天國畢竟沒有和什麼外國訂過不平等條約，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氣組織了『戈登勝利軍』，使太平天國內外受敵，而陷於失敗嗎？如果太平天國獲得勝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了新國，發揚了民氣，創立了國防，則外國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們這樣的國恥。所以，我們說，湘軍淮勇的功成，就是民衆失敗，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衆失敗，洋人成功，國恥自然就多起來了。

應該介紹孫中山先生的兩段話：

其一，『從前衰弱實因壓抑於專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便非提倡民權不可』。孫中山先生的話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先生遺訓在其信徒中的被遺棄，不是很可悽涼嗎？要救中國，必須發揮民權，必須把舊中國重新改造。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其所以要把舊中國重新改造，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太黑暗太殘酷太落後太虛偽嗎？不就是因為由於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無孔不入地剝削廣大人民，首先是農民的血汗，使得廣大人民飢寒交迫，因而使國民經濟不得發展起來嗎？不就是因為舊中國的統治方法從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權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機及其政治活動嗎？不就因為舊中國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嗎？不加改造的舊中國，如何站得起來？如何能夠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戰爭中不求進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夠最後戰勝敵人？然而不幸『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竟把這樣的舊中國寫成『黃金世界』，海禁開放前舊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風氣倫理又是那末好，一切都幾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切都那末好，為什麼打不過外國侵略者，而且要時常與當時的敵人作城下之盟，訂立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呢？本書的自相矛盾，在這裏又是一例。

妙文。

爲使讀者明瞭起見，把作者所描寫的中國古代『黃金世界』，抄列如下。讀者一見就知全是妙文。

關於『經濟』『我們立國的基礎，本是農業，全國的農業，除邊疆省區外，分佈既不失均衡，故全國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遠。政府對全國交通的計劃，平均周徧，世代相承，經濟的趨勢雖起自河流而傾向海岸，然而建國的成規，並不見有什麼偏枯的現象。』（見原書五九頁，以下只說頁數）

關於『社會組織』，『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鄉土，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爲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事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其自治的精神，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衆的福利，而不待於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教和社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羣力從事於修築和疏濬。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禮運所謂「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常活躍於中國固有的實際社會之中。』（六一至六二頁）

關於『社會風氣』，『社會風氣，五千年來尤爲我國先聖先賢所終身倡導和致力不倦的大業。社會的風氣仍能精誠篤實，勤勞儉樸，崇禮尚義，明廉知恥，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久存於世界，此實爲其基本原因。』（六二至六三頁）

關於『倫理』，『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乃至隣

里相鄰，疾病相助，實爲社會生活不變的常理。」（六七頁）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爲崇高的體系，比之於世界上任何別派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中華民族仍虛心接受外來的宗教，且能擷取外來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與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互相發明。（六九頁）

漪歎休哉！使我們走進了一個極樂世界，但是，既然舊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是那末好，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提出了『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那末喜歡保留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呢？既然舊中國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對人民有利，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舊中國的社會風氣和倫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爲全世界所不及，爲什麼日本帝國主義匪徒卻在淪陷區大大提倡中國『固有文化』『東方固有道德呢』？難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真的愛起中國民族來，所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些『好』東西來破壞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嗎？歷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慮的思想家來發現，有的則雖愚夫愚婦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匪徒之所以特別要中國人去保留發展這一切腐朽的陳舊的落後的東西，就是因爲這些東西是絞殺中國歷史發展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絞殺中國人民自覺的工具。蔣先生竭其全力去頌揚這些東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蔣先生所喜愛的這些東西，日本法西斯也喜愛，難道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嗎？至於蔣先生的唯心主義的歷史觀，我們是完全不同意的，爲篇幅所限，暫不詳論。

### 三 關於中國近代思潮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喜歡中國人保留中國各種舊東西，不喜歡中國人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近代化，就是說，不喜歡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的東西，不喜歡

中國人有科學有民主有自覺，因為接受西方人已有的先進東西，因為科學民主自覺這類東西，會使得中國變成近代的強盛中國，就不利於侵略者，所以不平等條約為中國人接受和發展西方先進的東西的桎梏，但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的見解，卻相反。好像因為有了不平等條約才使得中國人接受了歐美先進的思想，所以不平等條約是不好的，特別對於五四以來的各種新文化，作者極盡了漫罵的能事，所謂『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其重點就是對此而說的。

什麼是五四運動呢？請讓我們先引毛澤東同志《新民主主義論》的一段話：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着為辛亥革命運動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澈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五四運動所以有這種性質，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進一步的發展，而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階級，又眼見得俄、德、奧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受傷，而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份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文化革命，則是澈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澈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建功勞。』所以五四運動是中國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沒有土

地革命，沒有六年來的大抗戰。五四運動之所以遭受一切反動派反革命派的痛恨，其故即在於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受苦受難，並在中國培養一批洋奴。自曾國藩，李鴻章起，到現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在中國的一切徒子徒孫為止，此批奴才始終為外國侵略者服務，不因為他們主張中國舊文化，舊倫理，舊道德而就可以說不是漢奸，但另一方面，卻又迫得中國人民從迷夢中驚醒起來，迫得中國人民要去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用來反對外國侵略者，及其在中國的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反對舊中國的黑暗的殘酷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便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中國人民的先進者接受外國先進的光明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不利於外國侵略者，及其狗奴才。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中國的新思想，從太平天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便已開始了。譚嗣同的『仁學』對於中國舊倫理舊道德的網羅即作了一次勇敢的衝鋒。那時思想的反動派西太后的奴才，如葉德輝，張之洞等類人，便已在這種革新運動面前哭泣咒詛。他們卻一致說『倫理』『聖道』是永遠不變的。這種見解，一直到現在仍成為中國一切漢奸，一切反動派的衣鉢。五四運動形成了思想上的羣衆運動，就使得許多頑固派反動派洋奴才，都驚駭得不知所措，表現了新力量的不可抵抗。然而歷史運動是曲折的，有的繼續前進了，有的中途停止了，有的變節向後轉了，始終成為新文化中流砥柱和衝鋒陷陣的戰士，只是中國共產主義者和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代表了中國民族起死回生的方向，永遠不變，永遠不妥協，是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最偉大體現者。

『中國之命運』的作者這樣寫道。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他們崇拜外國是一樣的。其所以各成派別，是由於外國不止一國，外國的學說也不止一派。他們各仿一國，各宗一派。

，因而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各國的學說既不斷的變遷，所以他們無論那一派的持說，也是不得不隨之不斷的變化的。……至於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治，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請研究一下世界各國先進的思潮，確實有不同的。因為有一種進步思潮（比如民主主義），反映某一種進步的時代（反封建時代），為某一定進步的革命階級所需要，又有另一種更進步或最進步的思潮（共產主義），則又反映另一種更進步的時代（反資本主義時代），為某一定進步的革命的階級所需要。近代中國處在全世界大變革時代，中國內外各種關係，各種階級，各種社會人物的鬥爭錯綜在一起，因此，那怕在同一時候，世界各種不同的進步思潮，都可能為各種一定的社會階級代表所接受並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孫中山先生就接受西方林肯等人的民主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後來又接受俄國革命經驗。孫中山先生說過，『以俄國為師』，而代表中國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接受了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斯列寧主義，這兩方面在一九二四年後，就形成了彼此的合作。這是對民族極有利的。大革命業已證明了。又比如中國還有其他一部份自由主義者或民主主義者，他們的思想都反映了一定的階級或階層，而根據其需要，也可能在一定時候及一定問題上和共產主義形成一定的合作。這是對民族也有利的。許多事實也證明了。這一切是否『關於中國國計民生』，必須以民族利益民眾利益為考驗，除此外，一切都是詭辯。蔣先生在此公開反對英美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蘇俄的共產主義思想，實在可怪之至。一切法西斯國家以及漢奸汪精衛，不正是每時每刻都在狂吠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嗎？蔣先生此書一出，難道不怕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汪精衛輩引為同調而使羅斯福邱吉

爾斯太林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人們覺得可惜，覺得齒冷，覺得喪氣嗎？

其次 世界各國不但有進步和革命的思潮並且也有反動反革命的思潮。因為中國既然有進步與反動，有革命與反革命，那末，世界的反動反革命思潮也就會被某些中國人所歡迎崇拜，別的遠的不說，舉一個淺近的事實。國民黨官方出版的『三民主義半月刊』和『中央週刊』不是正在大宣傳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主義，並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寫為世界『六大領袖』之二嗎？這還是公開的。因為法西斯主義太臭了，太違反民族利益了，太不利於同盟國了，太為德意日這類匪幫張目了，所以有些人也就不便明目張胆，公開掛法西義斯主義的招牌，而用各種掩蔽形式，去販運法西斯的私貨，到處拍賣。這不僅是有一些國民黨官方中小人物如此做，就是大大的人物也竟然如此做。這難道不是天下共知的嗎？

又其次說『各立門戶，入主出奴』，每一個人亦應該自己想想的，中國有一位大人先生當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大革命的時候，認為蘇聯對他是有利的，於是自己就跑到蘇聯去請教一番，並派自己的兒子到蘇聯去留學，並宣稱『中國革命必須受第三國際領導』，後來反共了，反蘇了，於是到了東京，會見日本特務頭子頭山滿，宣稱中日聯合之必要，於是又進了『外國的』基督教，後來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了，就趕快派遣了自己的兒子及大批黨徒到德國去留學，學習法西斯主義。貨幣靠外國，軍械靠外國，有整整十年，還依靠這些去專打革命的中國人，而計劃這種戰爭的，卻又是外國人，——其中有一個很聞名的德國人，叫塞克特，是德國國防軍的領袖，還來了一個德國警察廳長專門傳授特務方法。抗戰了，貨幣軍械還是都靠外國，連仗都想專門依靠外國人去打，這些都是什麼？不正是所謂『入主出奴』的思想和行為嗎？這不就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嗎』？

至於要說到共產黨，那末，到也可以算一算看。中國民族的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斯列寧主義。它在馬克斯列寧主義這一個思想上，不但和蘇聯共產黨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思想相同。但是科學的馬克斯列寧主義，正是要求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根據自己的國情提出政綱，決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工作是這樣做的，他們為中國民族中國人民而創造了的各種進步力量，完全不是靠『外國』起來的。沒有一件軍械是靠外國幫助的，也沒有靠過外國錢作戰，戰略也全靠自己，一切都是『自力更生』。

○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抵抗日寇在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從不妄想外國人替中國人打仗，在中共勢力所及的地方，更從來沒有和外國人訂立過一條或半條的不平等條約，例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淞滬協定之類。中國共產黨人的政策和行動，到處為中國人民所歡迎，因為是符合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更從來沒有今天依靠這國，明天依靠那國，『入主出奴』翻雲覆雨的事。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的結果。這裏是一個十全十足的『為中國而學，亦為中國而用』的中國人自己的革命政黨。在中國再沒有可以和它相比擬的了。

中國從來顯然有兩種文化傳統思想，一種是民眾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種是反民眾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國一開始時候，太平天國與孫中山先生就是代表前者；曾國藩及現在中國的一切反共反人民份子，就是代表後者。不管太平天國有外國的思想『自由平等博愛』，邵是真正代表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英雄；不管曾國藩滿口舊中國的『仁義道德五倫五常』，卻仍是雙重的奴才，滿奴才和洋奴才。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國從來以至洪秀全孫中山一切優良的革命傳統，而一切反動派則繼承曾國藩葉德輝的傳統。反動派想取消前一種傳統，保留後一種傳統，而我們則正相反。關於中國思想文化問題上的分別就在這裡。

#### 四 關於國共關係